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目标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一点体会

裴长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任务,明确了未来若干年以及相当长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对此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深认识。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七个问题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基本路径和目标是,内外开放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七年来,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重大进展,成效十分显著,其中两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了整体开放水平的提高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进展。

首先是在试点基础上大面积布局自主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挂牌,并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 年)》。2015 年 4 月在广东、天津、福建设立第二批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决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扩区。2016 年 8 月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 7 个自贸试验区。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在海南全省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2019 年 8 月决定在上海临港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规划面积 873 平方公里。2019 年 8 月 26 日批准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六省区设立新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20 年 6 月 1 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海南设立自由贸易港及其改革方案。2020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北京、湖南、安徽三省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从 2013 年至 2020 年我国共在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 1 个自贸港),试验区面积将近 4 万平方公里。自贸区创造的经验陆续在全国推广,例如,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经验,要求全国海关从 2017 年开始普遍推广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 1/3,为扩大进口贸易提供了很大便利。再如,2014 年 1 月在上海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政策基础上,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此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经过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四次修改,产生了四个修订版。这些修订版的产生,都是与实践活动互动的结果。而这些规章制度的修订,为全国性法律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法治实践依据,并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外商投资准入。2016年以来由国务院及五部委发文在全国复制推广了四批72项创新经验,加上由有关部委推荐的创新操作案例,几年来累计复制推广223项。

其次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包括前言、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等九个部分,这是中国官方关于共建“一带一路”最完整、最权威的内涵阐释和政策宣示,指导并有效推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共建活动的快速发展。5年多来,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蒙俄、中哈、中柬、中老、中捷、中匈、中国文莱等多双边合作规划,而且通过开行中欧班列加强中国内陆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截至2019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20000列,其中2018年一年开行6363列,超过前几年开行数量的总和。2019年1-10月已开行6714列。国内开行中欧班列累计超过100列的城市有22个,通达17个国家56个城市,大大促进了我国内陆城市与境外的经济贸易合作。

“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的发展要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和提高,这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路径。为此,应当在《建议》精神的指导下,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坚持做更大的努力。

第一是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目前全国21个自由贸易区(港)已经覆盖东中西部,但分布还不够均衡,中西部省区偏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仍然有增设的必要和空间。另外,除了海南省和上海市,其他省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都只有120平方公里左右,其体量作为试验足够,但要带动一个省区的开放发展,仍嫌不足。因此,在有必要的省区,扩大试验区面积也是优化布局的一个重要措施。

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应当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减少通关费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目前各个自贸试验区进行的改革,主要着力点都放在节约时间成本上,并且取得了较大成效,但通关缴费成本仍然偏高,有待改革。福建自贸区首创“关检一站式查验”,实现作业时间一致、作业空间合并、作业系统并行,每个集装箱可节省查验时间50%、查验费用600元;厦门片区持续推进口岸降本增效,指导国有企业主动降费,引领和推动报关、货代、船代、物流、仓储、港口服务等环节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2019年厦门口岸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收费降至207美元/标箱,明显低于英国、德国、日本2016年的通关费用成本。这些经验也有待于在各自贸区和全国逐步推广。(2)解决准入不准营的问题。虽然实行了负面清单的投资准入管理制度,而且推行了“先照后证”的商事制度改革,但是服务业开放与原有管理体制和各个行业主管部门现行规章制度的改革不配套,因此出现“准入不准营”和“准入不能营”的现象。逐步实现主体许可与经营许可同步是未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应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解决主体准入与经营准入的不同步和政策不协调问题。逐步使这些领域从“证照分离”、“先照后证”走向“证照合一”,“照中

含证”。(3)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各部门的协调。由于服务贸易的开放涉及许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部门,因此,政策协调的部门范围需要扩大,如交通、通信、市政管理、卫生医疗、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科技、社会保险等各个部门。目前把自贸区的政策协调仅限于商务、经济、金融等部门显然是很不够的,应当扩大政策协调的范围,同时也要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和监管责任。

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应实现以下几个目标。(1)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更高。要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及机构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的精准监管,实现自由贸易港内企业自由生产经营。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投资自由便利,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强化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金融开放创新的步子更大。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以国内现有本外币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构建海南金融对外开放基础平台。通过金融账户隔离,建立资金“电子围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实现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提供基础条件,便利跨境贸易投资资金流动。进一步推动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便利化,实现银行真实性审核,从事前审查转为事后核查。在跨境融资领域,探索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完善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3)人员流动限制更少。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在有效防控涉外安全风险隐患的前提下,实行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对外籍高层次人才投资创业、讲学交流、经贸活动方面提供出入境便利。优化出入境边防检查管理,为商务人员、邮轮游艇提供出入境通关便利。(4)交通运输更自由便利。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船舶登记,研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航运经营管理体制及海员管理制度。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航权限制,优化航运路线,鼓励增加运力投放,增开航线航班。提升运输便利化和服务保障水平,提升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水平。(5)数据流动开放更安全可控。实现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创新安全制度设计,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有序扩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放。开放增值电信业务,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限制。允许实体注册、服务设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企业,面向自由贸易港全域及国际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

第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总结我们的经验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调整结构、稳中求进。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失,全球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双多边合作意愿也将随之变化。加上我国人才和能力建设方面的短板,因此应把战略视野和着眼点转移到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巩固已有成果、调整愿景构想、适应需求变化、增强能力建设上来。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形象比喻,把工作思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即从上项目、铺摊子、高速度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要明确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这主要是:共建双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统一;共建项目早期收获与长远发展统一;共建双方在经贸活动发展与政策沟通、规则、标准取得共识方面统

一。为此,应强调统筹外交、经贸和公共安全。外交的着眼点是国际政治和地缘关系,但经济贸易活动着眼“互利共赢”,即双方有利,而不是宁可我方不利、不盈。如果在共建项目中片面强调国际政治需要,而置我方企业利益于不顾,必然不能持久,而缺乏经济利益的基础,外交和政治也就没有保障。因此维护和保障中国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惠及东道国和合作伙伴的重要条件。公共安全是外交和经贸发展的兜底保障,特别是突发性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公共安全问题,应纳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总体考虑范围。

第三是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跨境电商是数字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应当大力发展。应依托政策优势和相对低廉的运营成本,鼓励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在海外设立更多的“海外仓”。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中国香港跨境电商及离岸贸易做仓储、分拣、物流等分包服务。全力扶持跨境电商企业做大做强,鼓励 B2C 跨境零售电商实行灵活销售模式,在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开展保税进口的同时,允许以行邮方式进口销售。积极引入 B2B 跨境电商企业,开展转口等离岸贸易。通过贸易创新发展,进一步增强外贸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用好进口国际博览会的平台,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汇聚全球资源要素,实现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

还应开展数字关境的技术研究,着手数字贸易特殊监管试验制度设计。数字关境从概念到实践,需要数字技术支撑,特别是对“数字足迹”的跟踪、记录是筑牢数字关境的关键性技术。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关境中的应用前景,着手解决相关技术难点。着手开展基于“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虚拟空间”海关数字贸易特殊监管试验,选取代表性行业开展离岸数据业务,赋予若干规模以上数据中心、云服务商、数据平台等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委托代理,为数字贸易监管政策制度创新积累经验。

第四是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随着中国走向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还需要更具有问题导向的顶层设计和实际步骤。其中文化走出去亟须实现从量到质的提升。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国已经在全球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51 所孔子学院,以及 1193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国的汉语言文化在世界上有了一定影响,但质量参差不齐、效果好坏参半,有的流于形式,或仅仅成为文化“联络处”。这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提高。医疗领域的开放也需要有新的路径突破。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应当细分不同行业属性,重点开放商品性比较强、福利性比较弱的行业。例如教育领域开放,应在职业技术、技能培训服务迈开更大步伐,形成竞争性市场;普通教育开放应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增加课程开放、专业开放等方式,不应当只围绕合作办学、取得学位一个模式。医疗领域的开放应当以补充国内医疗资源供给,引进先进医疗技术设备和医护人员为目标,更好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这需要统筹解决开放和国内改革配套问题,统筹考虑医疗器械、药品采购制度、医护人员流动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改革与开放。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目标应当瞄准提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培育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

第五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金融开放的深度取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实质上是人民币融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化。未来我们能在这一道路上走多远,需要研究资本项下开放所能承受的风险有多

大,以及识别和化解这种风险的能力有多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继续沿着人民币融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走,小心谨慎,时时需要考虑防控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家安全风险。另一条是建立在底线思维基础上,应突破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全垄断局面,创新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人民币资金国际支付系统作为补充。随着数字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域名的扩宽,我国应扶持建立具有根服务器的跨境运作的大型数字企业,利用我国自主建立的国际信息系统,推动人民币国际资金支付系统的建立,塑造新的人民币国际交易二元格局。既保留与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资金支付体系的联系并作为主渠道,同时努力培育相对独立于美元中心体系的东亚地区银行间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作为补充渠道,加快人民币在东亚地区自由可兑换,使其成为国际资金支付系统的区域体系。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首席专家)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涵与重要意义

黄群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全球治理规则调整的制度之变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创造式破坏,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使全球经济发展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巨变要求战略适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积极主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必然要求。

虽然经济学有众多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描述经济活动,但循环流动无疑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一个基于劳动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含服务)在家庭、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黄群慧,2020)。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者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基于国内分工的国内经济循环和基于全球分工的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参与程度不同的国际循环,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的不同意味着经济开放度的差异,无论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如何,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体)可以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可以根据系统环境和自

身条件的变化进行选择,可以通过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协同互补来有效发挥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同时避免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曾剑秋、任森,2005),这构成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

基于上述认识,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内涵。

一是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国际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其实质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我为主开新局。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两头在外”国际循环带来的问题,以及我国国内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各类条件的变化,必须审时度势、积极求变,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也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循环,更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经济内卷化等,而是在更高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

二是新发展格局以“经济循环”为描述维度、根本视角和关键词,而非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不能抛开经济循环这个动态系统的视角而单独从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来谈新发展格局。这决定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具有协同性和动态性的思维。也就是说,用“经济循环”描述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把握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根据供给侧、需求侧等单方面政策,也不单单是生产、流通、消费某个环节的战略或者政策,而是围绕经济循环的系统动态的政策组合。

三是新发展格局形成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的发展战略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对于以前的发展战略形成的发展格局需要进行战略创新和战略转型,需要拓展以前的比较优势,寻求适应新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优势基础,例如,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向高质量创新导向工业化战略,从“两头在外”的资源利用方式转向协调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等等;另一方面,由经济循环这个关键词所决定,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与以前强调某类经济主体、要素或者某方面经济活动应该达到的目标之类战略——例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制造强国、区域协调、创新驱动等等不同,新发展格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更具有系统协同性。也就是说,上述战略是专业性战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则属于综合性战略。从这个意义上,形成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类似于工业化、城镇化之类的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形成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积极顺应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要求。

一方面,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不断深化,逆全球化也给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全球债务的不断积累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原有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而20世纪末期,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这一全球经济调整趋势愈发明显,尤其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已有生产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总报告组,2020)。在这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需要在变局中开

新局,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本国优势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经济全球化新动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全球经济循环,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2020 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以此为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当然,有了大国经济基础,并不一定能形成新发展格局,还需要针对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诸多堵点、国内需求还存在较大抑制、经济安全风险比较大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依据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点,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从理论意义上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丰富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循环流动是经济学最早的范畴之一,也是经济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用循环流动描述经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 1758 年出版的《经济表》,因此熊彼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诞生于重农学派对循环流动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列昂惕夫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以循环流动理论——“可再生产性”论取代“稀缺”论,以此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乔治·吉利贝尔,2016)。因此,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指导。而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更是很好地延伸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形成了基于经济循环流动的新的发展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光明日报》2020 年 7 月 28 日。
2. 乔治·吉利贝尔:《循环流动》,载史蒂文·N. 杜尔劳夫、劳伦斯·E. 布卢姆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 曾剑秋、任森:《内外经济循环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应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 年第 8 期。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数字经济、数字化技术和数据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许宪春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政府治理、居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是数字化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之一,以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手段、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中国快速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如建议“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深刻认识数字经济、数字化技术和数据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

近年来,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保持快速发展。2017—2019年,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8%、30.7%、18.7%,年均增速为23.7%,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6.8个百分点。在减缓经济增速下降、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在减少经济下降幅度、促使经济增速回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GDP下降1.6%,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前三季度GDP增长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高于GDP增速15.2个百分点。

根据我们测算,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4.4%,明显高于同期8.3%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宪春、张美慧,2020)。

二、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治理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

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

(一)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

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品个性化、营销精准化、生产经营智能化、资源配置高效化等方面。

产品个性化突出体现在制造业企业面向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定制化服务。例如海尔、美的等家电企业搭建了以用户需求数据为驱动的产品制造体系,让用户、设计师和供应商通过数据流在互联网平台上互动协作,并通过柔性制造生产线将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转换成最终产品,提高了企业产品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营销精准化突出体现在电商零售类企业基于用户画像实现精准营销。例如京东基于大数据平台打造精准营销架构。通过收集用户在网上留下的日志数据、交易相关数据和非交易相关数据,基于建模分析,形成用户画像。进一步基于用户画像分析得出用户的产品偏好等,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APP 消息推送等渠道向用户进行定向产品推广,提升企业营销能力和盈利能力。

生产经营智能化突出体现在工业制造中的智能化生产线和农业生产中的智能种植和智能养殖。在智能化工业生产线方面,现代化工业制造生产线安装有数以千计的小型传感器,来探测温度、压力、热能、振动和噪声,每隔几秒就收集一次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实现多种形式的分析,包括设备诊断、用电量分析、能耗分析、质量事故分析、预测性维护等,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智能种植方面,利用传感器、无线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通过可视化展示,对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对农作物的产量进行预测,对病虫害进行监测等。在智能养殖方面,利用传统的耳标、可穿戴设备以及摄像头等收集畜禽产品数据,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深度学习算法判断畜禽产品健康状况、喂养状况、位置信息以及发情期预测等,对其进行精准管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例如,青岛宝佳自动化集团将大数据应用到生猪养殖-农作物种植全产业链中,形成完整的养-植绿色体系,通过大数据精准投喂,以最科学的投量比例保障生猪生理需求;根据大数据实时监测与预警生猪健康状况、养殖环境、生长特征等情况,确保生猪健康成长;同时关联农作物板块,将养殖中获得的排放物作为肥料科学喷洒至农作物中;依托种植数据库,构建土壤质量、农业环境、植物保护等完整的评估体系,保障农产品的茁壮生长,大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较大范围地降低了天灾人为导致的减产,提高了种养殖效率,实现了粮食牲畜增产增收。

资源配置高效化突出体现在交通出行类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司乘供需高效匹配,运输物流类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货源与运力的精准匹配等,促进企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数字化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数字化技术对政府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精细化、信息共享化、组织高效化等方面。

管理精细化突出体现在政府利用数字化技术畅通社情民意、改善城市治理等。在畅通社情民意方面,通过建设信息化平台,利用电脑或移动终端广泛、实时地收集民意,并快速做出反馈,促使意见反馈流程更加扁平化,政府能够即时、准确地了解和反馈社情民意。在改善城市治理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政府可以更好地触及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通过打造智慧城市实现对城市的精

细化管理。

信息共享化突出体现为“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将政务信息搬上云端,进行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跨越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为居民提供更方便的异地办理渠道,实现跨省协同工作和服务,打造更加贴心的服务型政府。随着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企业和居民信息得以在各部门之间流通,实现“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

组织高效化突出体现在政府部门利用数字化技术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提升治理效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线上“随手拍”业务,鼓励群众发挥城市主人翁作用,用手机随手拍下交通违法行为、反映交通管理问题,将群众纳入执法监督行列中,壮大社会监督力量。

(三)数字化技术在居民生活中的作用

数字化技术在居民生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就业灵活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便利化等方面。

就业灵活化突出体现在数字化技术推动了传统就业模式向“零工经济”的转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社交平台博主、网文写手等新的工作岗位,在就业方式、就业时间、就业地点上非常灵活,使劳动者可以充分平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例如哔哩哔哩、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培育了大量原创UP主、博主,他们可以自主选择全职或兼职工作,这为许多学生、公司职员、个体经营者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有些人在毕业或者辞掉原工作后,全职从事视频或文章的创作;也有些人在本职工作之外从事原创性娱乐内容的制作,工作方式灵活,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景下进行创作。又如UU跑腿是一款提供代送件、代取件、代送花、代买商品、代排队、代挂号等各类跑腿服务的软件,配送员“跑男”涵盖上班族、农民工等各类人群,“跑男”们在本职工作外的闲暇时间中,只需登录UU跑腿的手机APP,便可随时随地开始工作,平台根据其位置自动派单。“跑男”也可以随时停止工作,工作时间非常灵活。

公共服务均等化突出体现在数字化技术推动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不断发展,使落后地区也有机会享受到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例如慕课平台整合了许多名校名师的课程、讲座,给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提供了接触前沿知识的机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远程教学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大中小学利用钉钉、雨课堂、腾讯会议等网络平台进行网上远程教学,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在线实时互动。朗玛通过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帮助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患者借助视频向北京协和、四川华西等全国知名医院的专家求诊,这些都大大缩小了区域间、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数字化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促进了区域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生活便利化突出体现在数字化技术推动在线点餐、即时配送、在线VR看房、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新模式快速发展,给传统的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变革,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例如“贝壳找房”可以根据用户想要的户型、面积、价格等各种特征锁定目标房源,提供房屋详细的外观及周边展示,并提供VR看房服务,打造足不出户便可找房的体验。又如通过公共交通部门提供的公交、地铁的实时位置信息,居民可以更好地把握进站时间与进站点,更有效地管理时间,且进出站只需运用相关软件在进出站口扫描即可,不再需要烦琐的购票程序。高铁只需出示身份证,进出站机器智能识别出用户行程信息,不再需要烦琐的取票、人工验票等环节,提升高铁出行体验。

三、数据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大数据时代所造就的海量数据资源具有极大的数据挖掘及分析应用价值,是企业获取经济利

润的重要源泉。同时,企业的管理决策正逐渐从依靠传统经验向依靠即时数据转变,大数据大幅度提高了管理决策的效率和精确性,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已经成为有别于传统资产的新型资产,即数据资产。对许多新经济企业来说,传统资产在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而数据资产则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滴滴出行为例。滴滴出行在提供交通出行服务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司机行为、乘客行为等数据,这些数据已成为企业运营中的核心资产。滴滴出行运用大数据提供信息,以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云计算为基础,利用智能分单、供需预测、运力调度等技术,预测用户目的地和各地的需求量,实现司乘的智能供需匹配,解决了司乘信息不对称问题。滴滴快车、专车、出租车、顺风车、小巴等主要业务都运用大数据实现司乘的智能供需匹配,提高了司乘之间的供需匹配效率,降低了司机空驶率,节省了司机的经营成本;减少了乘客等待时间,优化了乘客出行体验。

又如货车帮,基于大量的车主和货主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及相关算法的运用,对车主和货主的要求进行精准预测和实时匹配,为货主提供最优的备选货车运输方案,为车主提供符合自身要求的货源信息。货车帮通过大数据整合了货车与货源信息,提高了车货匹配效率,使车主的车辆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减少货车空驶率;使货主的货物得以迅速运输,降低仓储成本。

可以预期,随着国家政策的日渐完善、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会不断深化,数据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治理中的作用会日益增强。要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数字化技术和数据资产的巨大发展潜力,探讨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提出对策建议,推动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5 期。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教授)

努力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 及 2035 年远景目标

李雪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目标和 2035 年的九大远景目标。这些目标描绘了我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对于激发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一、努力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锚定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建议》虽未明确提出未来 5 年经济增长的量化目标,但是,“十四五”规划仍可继续设定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目前我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二是从近年来已经绘制的经济改革蓝图看,“十四五”时期改革开放创新红利的释放有可能支撑一个合理适当的增长速度。

考虑到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十四五”时期 GDP 年均增速预期目标可设定在“5% 左右”,接近于潜在增速水平。这一目标既考虑了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和深化改革开放抢抓机遇的因素,又考虑了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及改革创新任务仍然较为艰巨的影响,同时也为推进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留有空间。

第一,从潜在增长率来看。根据对未来人口发展和就业的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逐渐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位于 5% ~ 6% 区间。将“十四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5% 左右”,将有助于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

第二,从外部需求来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一些国家政府及部分企业将供应链收缩到国内的倾向增强,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逆全球化效应。2020 年世界经济已陷入深度衰退,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基数效应,2021 年有望实现较高增速,但 2022—2025 年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大概率会再现低速增长态势,外部需求将制约我国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

第三,从内部需求来看。一方面,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市场优势;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受质量、技术、转型“三重挤压”存在供需错配,高附加值、生产性和创新性服务供给水平有待提高,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高杠杆率导致内需潜力尚未有效释放。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及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开放创新的进展,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四,从资源要素支撑来看。一方面,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具备了基本的总量支撑条件,针对这些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将推动五大要素市场自主有序流动,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任务仍然较为艰巨,一些改革措施需从局部试点起步,也要有一个过程。

第五,从基本现代化目标导向来看。“十四五”时期实事求是、高质量地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长,我国就能够在“十四五”期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我们的测算,在“高”“中”“低”三种情形下,到 202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分别达到 14130 美元、13850 美元和 13580 美元,均高于世界银行现行 12535 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此,“十四五”时期实现年均 5% 左右的经济增长,我国将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良好开局,并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此,“十四五”时期,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二、努力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九大远景目标,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我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在高收入阶段继续向前迈进一大步。该目标既鼓舞人心,又催人奋进。

考虑到我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的数据,目前全球有 70 个高收入国家,其中人均 GDP 排名位于中间 1/3 的国家,即排名在 24 位至 47 位的国家,其人均 GDP 介于 23500 ~ 43600 美元区间,可视为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只要达到 23500 美元以上(2019 年不变价),就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除了人均 GDP 标准之外,还需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教育和工业发达的国家。

《建议》提出,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跨国比较一般是以美元计价的,这将涉及未来 15 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化问题。有关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本币的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离程度远大于发达国家,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在跻身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一般都伴随着本币名义汇率向购买力平价的趋近。

为了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续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按照《建议》提出的远景目标,经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的不懈努力,到 2035 年,使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未来三个五年规划时期,可基于《建议》提出的 2035 年远景目标,通过优化和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福祉、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有关目标和指标的量化设定,促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实现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以当期美元计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张永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战略部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尤其是,在《建议》第十部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在经济上一直致力于追赶发达国家,但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并不是当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和独特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为什么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为什么需要新的现代化概念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未曾有的现代化成就。可以说,中国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那么,作为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为什么中国不是继续这种现代化轨迹,而是提出要彻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刘世锦、张永生等,2017)?

一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遇到了其他国家同样遇到的不可持续的世界性难题。具体包括:(1)基于传统工业化的现代化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问题,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等(Rockstro 等, 2009);(2)“现代社会病”,包括福祉、社会问题,以及因环境破坏和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大量健康问题。

二是中国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现代化概念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一些人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简单归于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在寻求现代化,为什么只有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这背后,中国无形的文化因素起着很大作用,而这些无形因素往往被忽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2. 现代化的新内涵

经济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what),即发展的内容;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how),即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how),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思考相对较少。中国自洋务运动后开启的现代化探索,主要集中在 how 的问题上。在 what 的问题上,则以发达国家为默认标准,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现代

化的内容本身进行太多质疑和反思。在 how 的问题上,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改革探索,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张永生,2019a)。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 what 的问题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不忘初心、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美好生活”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一系列新的理念、论断以及改革与发展战略,并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方式。这些新的提法,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深层问题和解决思路,其实质是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反思。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意义

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到绿色发展的转型,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新生事物。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上,中国正从过去的“学习者”努力成为“探索者”和“引领者”。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至少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工业时代现代化概念的超越(张永生,2019b)。

第一,超越传统工业时代的视野。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从“人与商品”的狭隘视野认识和满足人类需求,经济活动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并未充分纳入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决策范围。这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则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视野,从“人与自然”的更宏大视野衡量人类行为,为人类最优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系。

第二,超越传统工业时代价值观。发展的目的或初心是提高人们的福祉,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同的价值理念或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对应着不同的发展内容和资源概念。传统工业化模式强调物质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往往导致增长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生态文明则同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而保护环境就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

第三,超越了工业时代的标准经济发展理论。各国现有发展模式及奉行的发展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经济发展被视为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Lewis, 1955; Fujita 和 Krugman, 1995)。在环境和发展的认识上,传统的发展理论通常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两难选择,将所谓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视作发展的规律(Kutzets, 1955; Grossman 和 Kruger 1991),而这种“倒 U 型”曲线实际并不真正成立(Alexander 和 Rutherford, 2019)。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则揭示,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可以做到相互促进。

第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解决之道。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全球性目标难以实现。只有在生态文明的新发展范式下,这种冲突关系才可能成为相互兼容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生态文明就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解决之道。

二、有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从宪法、党章、国家发展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律体系、具体机制设计等不同层面,建立了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总体框架的顶层设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取得全面进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艰巨挑战。

第一,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少还停留在狭义的生态环境方面,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环保、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未能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环境问题的背后,是发展内容和方式的转

变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彻底转变生产方式,也要深刻转变消费方式。

第二,未能充分建立起生态文明目标的“自我实现”机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相关利益主体是否有相应的激励。由于现有发展理念、商业模式、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均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生态文明这种前瞻性思想,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支持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目前各地还普遍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以生态文明之名,行传统工业化之实。

第三,“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还存在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价值观念障碍。由于“绿水青山”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很多都是无形服务,它对生产和福祉改进的重要作用未能被充分认识。同时,由于目前人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转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转化机制的障碍。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建立在物质资源基础之上,更多的是将“物质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而生态文明更是将无形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这就要求不同的体制机制、发展内容、政策体系和商业模式等。

第四,生态文明理念未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方面,在一些重大战略和政策中未能充分体现。比如,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更需要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却是不加区分地刺激消费,将扩大消费作为增长的手段,在经济处于下行时更是如此。

三、今后努力的重点

第一,对现代化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并建立新的现代化测度标准。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展内容需要进行深刻转型。新的现代化道路,从一直以来关注 how 的问题,转变到同时关注 what 和 how。与此同时,目前关于经济现代化的测度,更多还是基于 GDP 标准。一旦在生态文明的更大框架下将传统模式下的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福祉成本等考虑在内,则原先一些在传统工业化狭隘视野下被视为高质量的发展,可能就成为低质量发展。因此,必须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概念转变 GDP 内容,并进一步淡化 GDP 的评估与考核作用。

第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现有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绿色转型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选择和协调问题。虽然转型有望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但个体却存在搭便车的激励。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以提供转型必需的公共产品。同时,由于绿色发展是一个全面转型,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亦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比如,对那些负外部性、长期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高和影响人们福祉的经济活动进行抑制,对那些绿色经济活动进行鼓励。

第三,通过创新引领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技术创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现有的价值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新的现代化不只是需要技术的创新,更需要上述方面全方位的创新。

第四,转变生活方式。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观念和消费模式全面而深刻的转变,即从节俭的生活方式向大规模消费的生活方式转变,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市场。同样地,从传统工业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也需要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以为新的绿色供给开辟需求空间。

第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尤其要植根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中小康概念

的原有内涵发扬光大,将其融入新的现代化论述中。原有小康概念的内涵同传统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不同含义,前者强调适度物质消费和人的全面发展,后者则基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而正是这种消费主义导致了全球范围不可持续的危机。

总之,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不是中国过去工业化模式的简单延续,也不是现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化内容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新思考和深刻转型。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只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刘世锦、张永生等:《绿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 2050》,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报告(<http://www.cciced.net/zcyj/yjbg/zcyjbg/2017/201801/P020180124359320301783.pdf>),2017。
2. 张永生:“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建立关于现代化的新论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四五”研究课题报告 2019a。
3. 张永生:《生态文明不等于绿色工业文明》,载潘家华等主编《美丽中国:新中国 70 年 70 人论生态文明》,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9b。
4. Alexander, S. , & Rutherford, J. , A Critique of Techno-optimism: Efficiency without Sufficiency is Lost.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 Print ISBN: 9781138048287 , 2019.
5. Fujita, M. , & Krugman, P. , 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 1995 , Vol. 25 , No. 4 , pp. 505 – 528.
6. Grossman, G. ,& Kru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AFTA agree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914 , 1991.
7. Kuznets, S. ,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45 , No. 1 , 1955 ,pp. 1 – 28.
8. Lewis, W.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1955.
9. Rockstro , M. , J. , Steffen, W. , Noone, K. , Persson, A. , Chapin, F. S. , Lambin, E. F. , … ,& Folke, C. ,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 No. 461 , 2009 ,pp. 472 – 475.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无 明 汀 兰